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4-0108-08

论费正清及其中国学研究对中美邦交的文化贡献

黄涛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之父,终生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耕耘,著作等身,而且钟情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以中美为基础的和平发展。在冷战以来长达三十余年的中美隔绝年代里,他一直处在中美关系前景的学术探索和“以学干政”的政策建议实践之中,并逐渐得到了美国决策层的认可和接受,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正式邦交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几十年用心和用笔赢得的中美邦交,使得费正清不仅获得了政治荣誉上的得偿所愿,而且增强了中国学事业的合理性和贡献率,有助于两个迥异文化代表的国家走在一起,对实现文明共享的全球化事业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费正清;中国学研究;中美邦交;文明共享

中图分类号: K25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4.015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5.24 - 1991.9.14)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学术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他在近 60 年的中国问题研究中,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而且是学术研究和政策评议的“两栖人”,对中美关系进程具有很大的历史影响。自战后摒弃国民党统治合法性后,费正清坚持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政治主张,首先允许别的国家与中国改善关系,允许和吸收中国参加多种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直至联合国的各种机构,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逐渐打开方便之门。费正清这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奔走呼号的坚持,主要经历几大时段:50 年代反击麦卡锡主义的开拓中国研究领域、60 年代反对越南战争的正确观念、60 与 70 年代之交的公开言论、70 年代不间断的呼吁和尽力参与推动中美建交的社会活动。所幸的是,皇天不负有心人,1972 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和 1979 年卡特政府对华正式邦交,改写了中美关系史,也推动了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无论从政治道义、学术

研究还是中美战略合作的时代高度上讲,费正清与中美邦交的历史成果关系甚密,荣载史册。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骤然而起的美苏为首冷战格局和朝鲜战争造成的中美对峙阴影,使得在美国政坛和新闻界报刊杂志上实事求是地探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如何把握良机和采取怎样稳妥的步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家间的关系,却是美国朝野不可回避的最重要外交论题。于是,像费正清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就首当其冲地站在公众舆论和政治献策的风口浪尖上,而且逐渐成为积极的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智囊库人物了。在费正清看来,对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文化及其近现代历史演变的了解,不仅是汉学本身的逻辑发展,而且是美国国家利益在这些地区实现的需要。或者说,美国对华政策不能仅仅以反共为目的,它还必须以对中国文化深入理解为依托。要实现对这种异质文化的理解,根本而现实的途径就是发展教育。除专业性的高校教育和高素养的毕业生的自律和传播之外,更需要对美国公众进行中国知识“再教育”

收稿日期:2019-02-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中国学巨擘费正清研究”(项目编号:16BZS065)。

作者简介:黄涛(1970-),男,安徽桐城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史、美国汉学和国际关系研究。

的普遍性活动。在依托哈佛大学教坛上的中国知识传授之外,费正清还亲自撰文解释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打破隔绝达于邦交的趋势。这样的过程,既有震动性的激变,也有潜移默化的转变,是作为历史学家和“中国通”的费正清擅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

费正清指出:二战结束后不久的中国内战和美国一边倒向国民党政府的最终结局,造成美国与新中国长达20多年隔绝,显然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尤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巨大损失。美国在越南政策上的重大失败,至少说明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任何阻拦它的企图都是不明智的;其次,美国虽然在亚洲有经济和战略上的利益,但美国的力量确实有限,难于在海外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常规战争。此外,军事行动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遏阻共产主义,而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有美国难于承受的代价。^{[1](P200)}尼克松1968年当选美国总统后,很快认识到跟中国和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意降低对中国的敌对语气。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自是深谙远交近攻之道,早在1968年就宣布愿意跟美国恢复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并愿意跟华盛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谅解。1969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来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2](P171-172)}

如果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和越南战争胶着状态下几乎同时意识到中美关系转机的历史机遇,美国政府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和中国总理周恩来用他们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巧妙地加速这一历史进程的话,那么,作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头面人物,费正清在其中的历史作用也是值得荣载史册的。

费正清在1943年就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心,并对自己政府扶蒋反共政策不满,更反对起自50年代对华孤立政策和卷入越南战争。作为哈佛大学的学者和教授,费正清的讲课基于

坚实的史实依据,而且时常要求学生注意与事件相关的推论。作为社会活动家和美国政府政策的智囊人物之一,在公开讲演中,他曾经推测美国的东亚政策,反对对中国和日本作出革命和民族主义的推测,他认为最终问题与机会总是并存的,他常以别人无法企及的智慧和幽默,证明历史的嘲弄,尤其他在一大群听众面前讲述越南战争时,他对于美国政策的洞察力、美国对东亚政策更早的危机所作的批评,表达出他对历史的清醒认识。在他心目中,从不放弃任何机会,竭力推销他的东亚重要论。^{[3](P73)}出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共思想意识的了解,费正清认为美国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跟中共对话,并通过对话来化解敌意,寻求共同点,避免冲突。从1966年起,他开始探讨美中关系的前景,寻找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最早的一篇檄文,是他1966年6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关于中国的新思考》的文章,对美国政府现行对华政策提出了质疑。为了使美国政府能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费正清还力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的角度,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他利用哈佛东亚中心人才荟萃的优势,相继组织了一些重要课题的集体研究。参加这些课题研究的不仅有他的弟子,而且还有哈佛和其他大学的中国研究专家。研讨的内容集中在中国的外交关系上,成果包括他个人的论文集《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1967年)和分别在1968年、1974年以《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国和美国的传教组织》《中国人的战争方式》为书名出版的论文集。这些论文集成为区域研究的典范,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而且每个文集意味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具有明显的开拓意义。承载在上述书籍之上的重要的学术观点,在对华政策建议上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费正清指出,要实现中美对话乃至中美邦交,必须首要解决掉两大障碍:一是越战问题,二是台湾问题。这就体现出了费正清清晰而正确的思想水平,“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有共识,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确信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对整个世界有好处。自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胜利后的二十年间,中美之间的对抗和误解使上述的想法几乎无法成为现实。但是费正清从不灰心。1967年安·阿伯东方学大会期间举办论坛。这个论坛以恢复两大国间的正常外交关系的重要性

作为它的中心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在那儿,我很清晰地看到了在这个人身上的信念的力量和钢铁般的坚强。”^{[3](P201)}费正清还断言,即使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也解决不了问题,其结果倒可能像当年日本轰炸珍珠港一样使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因此,美国应该开展积极的外交攻势,谋求与北京的和解,进而打破越南战争的僵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我们在越南军事上逐步升级为以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孤立的局面制造了契机,如果我们的产品已经经第三国转卖到了中国,那么我们的反华贸易禁运还有什么意义呢?徒具虚名还不如彻底取消会更有意义,而对于北京加入联合国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加以阻拦。”^{[4](P504)}在台湾问题上,费正清也撰写了一系列清除这个美中邦交障碍的相关文章,如《美国的无知与亚洲政策》、《台北能与北京和平共处》(1972年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等。《台北能与北京和平共处》再次探究尼克松总统首访北京的成功几率和期望值,也是对1971年8月12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北京主权下的台湾自治》一文论点的再强调,他断言,如果台湾问题能够留给中国人自己去处理,那么中美关系的进程是可以由北京来推动。

费正清是一位务实的历史学者和政治思想家,历史终究给了他不小的回报。以反共上台的尼克松在1969年伊始出任美国总统后,决定恢复中美邦交来加强同苏联抗衡的力量,修正了冷战的概念,对旨在遏制中共的有关政策作了很大改动,并开始注意费正清等中国学家的对华研究成果。在寻找中美和解的突破口问题上,费正清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外交技术上的计策和思路。大约是1967年或1968年的某一天,费正清在从纽约开往波士顿的东行列车上遇到了基辛格,双方就中美关系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化的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他向基辛格讲述了中国纳贡制度的先例,按照这种制度,凡是到北京参拜的外国君主都是皇帝的贵宾。“我们美国的总统可以毫无顾忌地来往于世界各地,但毛泽东就不同了,他可以在家里接见任何国家元首,但他决不会轻易自己到国外去访问”。同时,费正清送给基辛格一本他的单行本论文,这篇论文曾于1966年12月27日在《邂逅》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人的外交

传统》。从此,费正清与基辛格保持着个人交往和学术联系,当他的专题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在1968年问世后,立即赠送给基辛格一本。费正清在谈话和赠送的论著中,明确地分析了中华帝国的外交政策,以具体例子说明中国文化虽然有妄自尊大的一面,但是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却是自卫。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些见解打开了基辛格对中国知识的茅塞,“后来,基辛格博士在一次跟我交谈中又回忆到我们的那次谈话,他含蓄地说,这次谈话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我本人也由衷赞赏他私闯虎穴的胆量。当然,这种想法是显而易见和不言自明的。”

1971年7月,以穿梭外交著称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帮助下,秘密访问中国,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开放的滥觞,同时也是中国对美国开放的先兆。7月15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尼克松总统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北京。尼克松的访华决定,全世界注目,使费正清为之一振。在7月19日的《华盛顿邮报》上,费正清著文《北京接见外国统治者已有一千年》,公开为这一外交上的突破喝彩。他认为:“尼克松先生不会逗留足够长的时间去忍受文化的冲击和中国化,但是中国的现实情景也许使他受到影响,即使是简短的。为了避免发生像旧时的部落首领那样被摆布,最好的预防办法是仔细的准备和严格地尊奉礼仪守则,这可防止出现尼克松与尼基塔·赫鲁晓夫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的重演”,因为在中国,尊严比辩护更重要。一周后,费正清又在1971年7月26日的《新闻周刊》上著文《尼克松总统的奖赏》,盛赞即将成行的尼克松访华将会使美国的东亚政策更加符合外交现实。这种创造性所包含的内容将是范围广泛的,如戳破了台湾重返大陆的幻想、提供给北京一个采取积极同美国谈判的选择机会,以及使得美国不大可能继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唯一的消极后果也许是对该地区的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日本和苏联引起瞬息间的外交变动。^{[4](P516-517)}在费正清看来,尼克松即将访华和中美直接接触的历史意义十分巨大:“尼克松先生为了和平而即将进行的从华盛顿到北京的旅行,无疑已经取得成功,其成功的程度大致与我们从越南的其余部队为了和平已经踏上从西贡到旧

金山的规程相仿”、“不管尼克松之行能否开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这种关系仍将被广泛展开的‘人民外交’所掩盖,尼克松之行依然着重说明了他本人对和平的追求,他必须承担一些义务,并履行自己的诺言”、“理智地说,北京之行是一位美国总统通常进行的旅行中最漫长的旅行。这样说是稳妥的。行前的准备是不会过分的。”^{[7](P209-210)}而更使费正清聊以自慰的是,他的《美国与中国》第三版(1971年)被中国方面迅速翻译成中文,供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参考。费正清的名字从此在中国大陆不胫而走。这本书名义上是“内部发行”,但由于文革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得以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广为流传。事实证明,这部被学术界称之为“中美比较研究的教科书”、“美国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活地图”的《美国与中国》,几乎是同时摆上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案头。显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费正清的远见卓识终于受到中美双方高层的重视。他的许多学术研究论著也越来越成为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制定双边政策的主要参考书。

一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成功,打破了美国与中国二十余年隔绝的坚冰,达成的初步谅解将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奠定了政治交往的基础。用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说,“它弥合了‘相隔16000英里和22年的敌意’。”^{[5](P387-392)}中国官方报刊如《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详尽报道这一重大事件,刊登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会谈照片,并且全文转载中美两国政府的上海联合公报。美国的各大报纸也争先恐后地对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作了报道。费正清在晚年自传中曾对尼克松总统飞抵中国的最初瞬间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和评论:“发自北京机场的电视图像使我们亲眼目睹了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的瞬间场面,但那里却没有一位历史学家亲临现场去领悟这一时刻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意义。一排排头戴皮帽的仪仗队威武地站立在寒冷的飞机跑道上,他们正在静静地等候。不一会,‘空军一号’那高昂的机首渐渐出现在电视屏幕的上方,慢慢地降落下来,她高大而庄严,非任何炮舰可以媲美。舱门打开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高大的身影展现在人

们眼前,他略带犹豫地走下舷梯,他或许在想,这里会不会隐藏着‘第七次危机’(尼克松曾写过一本书名《六次危机》的书,记述自己的政治生涯)。而走上前来和他握手的正是1954年在日内瓦备受杜勒斯先生冷落的周恩来。紧接着,画面又转到了中国一方——贵宾检阅仪仗队。这种阅兵式既是一种小事,也是一件大事。随着镜头的转移,尼克松先生,独自一人走过长长的三军仪仗队。他向后扫了一眼,周恩来走在他的右后方,示意他继续前进。几千年来,数以万计的外国君主就是这样蹒跚地走过长达数里全副武装的仪仗队,在众目睽睽之下觐见中国的皇帝。2月21日的简短的阅兵式就好像是美利坚国王的朝贡行列,对中国朝廷纳贡称臣。”^{[6](P429)}

这次破冰之旅的意义并非全世界普遍乐意接受的历史现实,因为中美关系的任何发展势必改变整个亚洲和西太平洋的国际关系格局,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南朝鲜的关系也将随之受到调整。关切这个地区局势的人自然要斟酌尼克松访华带来的利弊。很显然,尼克松总统成功访华,远远不是费正清等中国问题专家所希冀的美中建交的历史瞻望。这条路依然充满着艰辛和未知,却是他孜孜再求的使命:完全实现美中建交!

打破坚冰后的中美两国迟迟未能实现邦交,主要由于美方的原因,这种情状似乎早在费正清的预料之中。与台湾关系的纠缠不清是美国方面的原因之一,而更严重的是美国自身对中国“真相”的假定也对这种不正常的政治氛围起着隐形而巨大的抑制作用。在尼克松总统赴华访问的第三天,即1972年2月24日,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开始认识你》,比较鲜明地阐述了这种自我感觉的弊害,他写道:“一种残留的矛盾心理构成了我们在冷战后对中国的看法。这些同样的中国人在50年代可能是这样坏的家伙,而今天怎么又成了这样好的人呢?这种看法的跳跃式变化,部分原因来自于我们自己对外国现实的解释从一种说法跳跃到另一种说法的接受力。我们对遥远之地而无法直接观察的现实的理解当然要被这种我们感知的方式所削弱。在任何限定的时期中,关于中国的‘真相’都在我们的头脑中,对于储存如此有价值的物品来说,这是一个极不安全的仓库。”^{[4](P518)}费正清指出,中美关系的破冰

是一个好的政治开端,但如果没有邦交正常化的最后奠基,随时都有半途而废或前功尽弃的危险。作为中美建交的重要舆论推动者之一,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联合公报》并没有令费正清喜不自禁,反而使他立即成为中美正式邦交的“主要鼓吹者”和推动者,并在这种历史性的转折点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7](P368)}

在1972至1979年间,费正清不间断地著书立说呼吁和勉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来推动美中邦交。针对美中正式邦交之前重大障碍的台湾问题,费正清在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以及“台独”运动上的立场是相当审慎的。他不止一次地撰文讨论美国对华政策,说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必要以及由此引起的台湾地位问题。美国在《上海联合公报》中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主要是出于它的全球战略的需要,是一种外交上的权宜之计。而费正清却将这一原则看成是美中邦交的长久之策,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道义依据。他曾指出,保持台湾的现状跟美中邦交正常化没有根本的冲突,“更明确地承认大陆中国的存在,同时又把自己从中华帝国的大统一的神话中解放出来,终归是向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在他看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修好是全人类生存的需要,而稳定台湾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之一。^[8]此外,费正清还在1967年出版了《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论文集、1972年发表了《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与中国》一文、1974年出版了《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想象和政策》论文集、1975年出版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概要》一书,更在1971年和1979年推出了《美国与中国》第三版和第四版。在这些论著中,他都对近百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价,并对一些具体问题如传教士与中美关系、台湾与中美关系等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而且,更可贵的是,作为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权威人士,费正清认为中美自1972年以来迟迟不建交的不正常状态应该尽快结束,美方应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这是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他在1976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美国的现行政策中,存在着一个中国的理论与美国同两个政权打交道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美国支持流亡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得不偿失,因为“从长远看,对我们来说,与中国大陆保持和平要比台湾

更为重要”。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当机立断,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9](P130-140)}

或许是费正清的学术执着和正确信念感动了上苍,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现实需要,1978年4月,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公开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同年12月4日,中美双方达成三项协议,即: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简称《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12月31日,台湾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旗帜降落,台湾“大使馆”正式关闭,台湾在美国14个城市的“领事馆”也同时关闭。

就在美中邦交之前的两年内,即1977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历史系完全退休。由于需要完成编撰《剑桥中国史》和整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的来往书信等大型科研项目,他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上。但是作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仍然经常总结和展望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在美中邦交正常化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费正清连续出版了《透视毛的中国》和《观察中国》两部新作,更是不可或缺地涉及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他站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高度,更深刻评析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从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方面为中美关系新发展提供了冷静而前瞻性的理论原则和观察结论。

因此,在1979年1月美中正式建交的历史性成果里,永远都有一份属于费正清的努力。而这或许是费正清这位一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帝

国皇帝”的最大成就感。

三

美中正式邦交,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又一项创世纪的壮举,也是识时务的美国人民最伟大的政治成果。对于美国学术界巨匠之一的费正清而言,这更是他在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后的一种全新收获,是他睿智预言的现实化历史事件,自是“大功”一件。对这种近乎全方位的奔走呼号下所取得的成就,费正清感到无限欣慰,也在更大程度上坚定了他在在中国研究事业上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坚信了学问和教化的伟大的社会进步力量:“费正清生活在一个冷战的年代,也是美国左、右翼就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不宣而战的内战时代,尤其是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显然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其他讲英语的历史学家,称得上是儒家经典中屡遭挫折的‘圣人’,感到自己有责任责难华盛顿的历任总统,批评他们最近的决策灾难。然而,他遭到浅薄的权臣和围着他们转的公众的冷落,其境遇比起在梁惠王那里遭冷遇的孟子有过之无不及。多少次,费正清像在他之前的中国文人们一样,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从长远眼光看,学问与教化,远远要比忙着去改朝换代和与暂时控制王权的宦官们斗争来得重要。1970年当尼克松下令进攻柬埔寨时,费正清召集东亚研究中心的成员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这次危机。他满怀希望,但却错误地预言1972年尼克松将会下台。他提醒说,哈佛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悠久两倍,我们会幸存下来。我们仍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0]诚然,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美中邦交正常化并不是全美一盘棋的统一行动,费正清的奔走呼号是一场艰难的学术与政治权力的较量,可喜的是它最终变成了现实。在这个较量的过程中,费正清显示了他卓越的忍耐力和独特的自信,“费正清是中国传统学者的美国化的翻版,他通过写信与同事、学生通信、写备忘录,而建立一个巨大的网络,他是这个网络的中心和源头,甚至在他自己写书和出席国会小组委员会的同时也从不放弃。”^{[3](P100-101)}

当然,在为费正清实现他的学术理想和美中建交的政治夙愿而深感欣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中美建交也是一种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大势所

趋,无论当时的政治家、学者和普通民众都是历史潮流的见证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失去了承认新中国的机会,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下,中美关系也处于冷战状态。朝鲜战争结束到中美破冰之间,美国历经四位总统当政,即艾森豪威尔(1954-1961)、肯尼迪(1961-1963)、约翰逊(1963-1968)和尼克松(1968-1974)。前三位总统执政期间,由于诸多国际因素的影响,各个总统在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原则上沿用了杜鲁门在1949年12月30日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48-2研究报告中讲的“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的原则及其具体的对华政策,包括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实行禁运和在军事上包围的遏制并孤立中国的做法。^{[3](P101)}但从6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并非铁板一块的完全敌对,毕竟政治总是有点兵不厌诈的味道,表面行动与实质政策的近似性是真实的,有些事实总是引导中美在靠近的过程之中。一是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有了对话的渠道,艾森豪威尔执政后,经过英国斡旋,从1955年8月1日起,中国和美国在第三国开始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此两国有了官方交流的渠道,两国领导人有机会了解对方的情况和意向。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持续到1970年,历时15年,共136次,而1960年召开的会谈是第100次,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最后一次会谈。二是美方出现一些缓和迹象,如肯尼迪曾要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和约翰逊曾表示要与中国缓和关系,但粮食援助和美国医生与学者访问中国的请求都遭到中方拒绝。三是尼克松执政时,中国成为亚洲大国的事实已经不可否认了,这位一贯坚决反共的总统上台后,为早日从越南战争中脱身,通过不同渠道寻求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乒乓外交”之举,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最终能够坐到一起。^{[11](P178)}

好事多磨,尼克松主动访华打破坚冰之后,中美两国都有自己难言之痛:水门事件导致美国政党执政的较量延缓了与华邦交的历史进程,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因忙于内争而亦无暇外顾,使得中美正式建交的步伐一缓再缓。直到1979年元旦,美国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了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中美正式邦交的欣慰,并非属于费正清

独享的胜利,而是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美国“中国通”们的战果之一。学术界里的“中国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为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做出了荣载史册的巨大贡献。美国“中国通”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回到公众的视线当中,费正清和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不仅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智囊团人物,而且还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决策者和美国民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最终促成了中美邦交正常化。美国的“中国通”们在中美关系方面的历史活动和主要贡献主要有:他们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议案,包括主张政治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存在的政体,不会马上消失;承认经济上的禁运是个失败,主张与中国进行除战略物资外的贸易往来;主张必须与中国进行比大使级谈判规格更高的对话;主张让中国参与如裁军等重大国际事务;主张在联大搞一中一台,而不是把中国拒于联大门外;主张让美国公民去中国旅游;最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通”们通常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考虑对华政策的。但因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了解和研究,加之有的在中国出生和生活过(鲍大可1921年10月8日出生在上海,1936年回国;小詹姆斯·汤姆森1931年9月14日出生在南京,1939年回国)、有的1949年以前在中国工作过(费正清、鲍大可),他们会比较理性地、客观地提出对华政策和判断。回顾这段历史,使我们看到他们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中国通”在政府内和学术界进行努力,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

正当费正清非常欣慰于美中邦交正式实现的时候,又一件令他欣慰的邀请发生了。1979年1月,倔强而实干的邓小平副总理出访美国,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欢迎会。费正清作为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代表,被邀至首席作陪。“能享此殊荣,真感到万分的荣幸!莫非我真成了为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奔走了30年的一派人的象征不成。然而我本人确实不敢有此奢望,我自知力不从心,作用有限。能坐在皇后影星和第一夫人中间,我不禁顿感左右逢源、春风得意”。席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费正清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您高寿多少?72。我74了。可您满头黑发,我

却谢顶了。显然是您用脑过度了”。如此简单的对话,让费正清颇感失去一次机会,“我们本该相互祝酒,追思故去的周恩来,而后再谈建立中国式的友谊,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12]然而,参加这次宴会之后,费正清似乎有些缄默。当他的学生、勃兰德斯大学历史教授石约翰偶遇他时提及这件事,“在那种场合,你到底怎么做呢?”费正清回答说:“首先和坐在你左边的女士交谈,再与坐在你右边的女士交谈”。他这种自我谦虚,在学术领域内是不常见的,看上去好像是出于他惊人的个人安全感,当然这是完全有理由的。^[12]

接踵而至的欣慰,则是费正清夫妇获得了再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机,即1979年8月随同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回访中国。费正清是被邀作为一名幕后智囊一同前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同志拿着酒杯走到费氏席旁,举杯对他说:“在恢复中美关系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费正清建议为纪念周总理干杯,他大慰情怀地、发自肺腑地感叹:“1979年结束了中美两国间30多年的疏远状况,也结束了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50年的奔走呼号。”

之后的促进和加强中美双边关系的活动,则构成了费正清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使命推向更为长远时代的志在千里的蓝图。也就是说,1979年是一个转折点,但不是终点,中美关系仍旧需要更深更广地拓展。正如在自传的结束语的开端,费正清发出了老当益壮的豪情之语:“1979年是中美两国结束长达30年之久的疏远状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年,也是我50年来孜孜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事业告一段落的一年。通过我本人与中国最近20年的交往,我的同胞们已初步了解了中国,当然也应该看到,本人的这些努力与中美两国长达30年的隔离状态是同步进行的。到1979年,历史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同时也给我个人带来了转机。万事齐备,只待展翅飞翔。”^{[4](P562-563)}费正清虽在1991年病逝,但他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仍对中美关系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例如,他一再强调的中美对“人权”问题因文化、历史和社会价值判断的不同而必然出现分歧,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成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主要竞争对手等观点,将对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有重大的历史参考

价值。

总之,中美邦交终究得偿所愿,是国际关系史中的快意阶段,但总是带有那么多不该有的酸楚。长达三十年的中美阻绝和异常艰难的恢复邦交,对费正清而言都是不堪回首的。就在中美正式建交后的第三年,即1982年,费正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魂系中国》。作为一位年数已高、退休在家的大学者,他在该书中,不仅回顾了自己在在中国学研究事业中的过程,而且再次惋惜地看待中美三十年的交恶,并谆谆告诫这种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能永远保持下去,利国利民,造福全人类。他认为“事情本来可不必发展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大可不必那样义愤、激烈、费心竭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如果我们对这场革命了解得更多一点儿,对自己的恐惧感的认识能客观一点儿的话,我们本来可以更好地应付这一形势”。显

然,他的经典评论不仅抓住了中美交恶的历史实质,而且显示出他一直坚守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夙愿。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费正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坚持了友好而公正的立场。这种公正,并不否定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根本的分歧。他始终认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美国和中国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来消除无知、恐惧、猜疑和敌意而取得妥协和相互容忍。在他看来,通向稳定的道路不是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实施对中国开放时所划分的那种战略利益的共同性。相反,它是通过识别文化的差异及对它们的认可来实现。费正清探索的不是不同的世界强国之间的缓和,而是不同的世界之间的缓和。简而言之,容忍差异是通向未来的关键。^{[3](P96)}这种文化认识和学术远见,对于今天建立新型的中美关系乃至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邓鹏.费正清评传[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7.
- [2] [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M].伍协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3] [美]保罗·柯文,墨尔·戈德曼.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M].朱政惠,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 [4]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M].黎鸣,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5] 费正清.费正清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 [6] [美]戴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M].周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7] [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M].陈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8] 许国琦.略论费正清[J].美国研究,1994,(2).
- [9] 费正清.解决我们的一个中国问题[A].费正清.观察中国[C].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
- [10] 夏明亮.西方中国学之父费正清[J].文史月刊,2007,(7).
- [11] [美]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M].徐泽荣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
- [12] 顾宁.美国的中国通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美中关系[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5).

On Cultural Contribution to Sino-US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of Fairbank and his Chinese Studies

HUANG Tao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As the father of American Chinese Studies, John King Fairbank has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researches in Chinese issues, and published a prolific body of works. He advocated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hip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both countries. In the thirty years of Cold War with total iso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he conducted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prospects of Sino-US relationship and offered political advice on this issue to the American authorities. H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for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hip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y persuading the American authorities to accept his advice. With decades of efforts by his heart and pen, he was greatly honored in politics and enhanced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Studies in US, which was helpful for two nations representing widely different cultures to join together.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sharing civilization globally.

Key words: John King Fairbank; Researches on Chinese Studies; Sino-US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 civilization sharing

(责任编辑:庄暨军)